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徐俊西

思潮卷



主编◎余俊西



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本卷主编 王纪人

思潮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 50 年文学批评丛书: 思潮卷 / 徐俊西主编; 王纪人分卷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0
ISBN 7-5617-2079-3

I . 上… II . ①徐… ②王…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上海
IV .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564 号

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思 潮 卷

主 编 / 徐俊西

本卷主编 / 王纪人

组稿编辑 / 王 焰

责任编辑 / 王 焰

责任校对 / 邱红穗

封面设计 / 陶雪华

版式设计 / 蒋 克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邮编 200062

印 刷 /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850 × 1168 32 开

15.5 印张 2 插页 38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7-5617-2079-3 / I · 200

定 价 / 25.00 元

出 版 人 / 朱杰人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20 年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情感形式也都发生了深刻而急遽的变革。古人云，“文变染乎世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我国 50 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今天当我们通过编写这套丛书来审视既往和瞻望未来时，便深切地感到时代的变迁和文艺的风云给我们文艺批评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记取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 17 年，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虽然一度呈现过意气风发的兴盛景象，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政治斗争和极左思潮已日趋激烈，特别是当最初几次在文艺界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展以后，文艺领域的创造空间和舆论环境变得更加狭窄严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部选集中所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仍然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研究者们对新的学术理论课题和文学创作研究的热情和取得的成果。

首先，在理论建设方面，以王元化、蒋孔阳、钱谷融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们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阐释新社会的文艺现象，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西方美学

和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以无论在美学、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都为我们坚守着一隅可供精神栖息的宝贵的审美空间和学术领地，这无论是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值得珍惜的。时至今日，这些非常坚实深厚和具有学术品格的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吸取和重视。

其次，在极左思潮日益泛滥，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日渐丧失的年代里，对于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莫过于在坚持自己正确的理论观点的同时，敢于对违反人性和艺术创作规律的思想行为进行抗争。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既需要理论的勇气，又需要人格的力量。由此当我们现在重新读到巴金、王西彦、徐中玉等人直抒胸臆的真知灼见和刚正之言时，就不能不为之感动。例如巴老 1962 年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一面用充满嘲讽和厌恶的口气表示，“我有些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和“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一面又满怀激情地呼吁，“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销声匿迹”。这是多么诚恳和率真的愿望啊。

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结束了极左路线肆虐的文化专制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政治热潮带动了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步伐。而作为这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复归。在这方面，上海的文学家们自是热情高涨，积极投入，释放出多年来被压抑、被禁锢的创造激情和思想活力，老中青三代形成合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文学理论批评活跃繁荣的局面。

为了使多年来被各种政治教条和极左思潮作践得气息奄奄、面目全非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生机，上海的理论批评界通过

“为文艺正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口号的否定和修正)、“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讨论(对“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种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定义的质疑和争论)、“知性分析方法”的解析(对简单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方法的辨正)等重要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问题的批评争论,从政治上、理论上、方法上划清了现实主义传统和非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的界线,揭露了各种错误思潮和理论的危害,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复归”式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现实主义的深化已成为当时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在具体理论形态上的表述,就是本质和现象、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情、认识和审美等从一元到多元的转换和多样性的统一,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审美反映更符合艺术规律和时代特征。在这方面,丛书中的许多文论,诸如《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蒋孔阳)、《论艺术美的延续性》(余秋雨)、《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思考——漫谈新时期的当代文学评论》(潘旭澜)以及在“重写文学史”的名义下开展的对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再认识和重新评论,都显示了上海文艺理论家在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批评方面的新的视野和理论成果。

作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活跃繁荣的另一表征,就是在现实主义回归和深化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流派一下都涌入我们的文坛。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正像当时的人们所说,我国新时期的文坛上几乎历演了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世界所有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而大家知道,在这种新奇庞杂、异彩纷呈的文化浪潮中,上海文艺界也不惮前趋,一时涌现了许多评介传播这些新学科、新观念的理论译著和新潮人物,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组为现代派文学鸣锣开道和象征着我国文艺园地春色将临的几只文学评论的“风筝”,最早就是从上海的文艺刊

物《上海文学》上放飞出来的。在这期间,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们除了对现代主义的观念更新和方法热表现出极大的求新欲望和参与热情外,还较早地从盲目模仿和简单搬用转向了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辨析。其中如南帆等人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当时一哄而起的“方法热”作了犀利警策的剖析,认为名目繁多的新批评方法的涌入和运用“仅仅理解为表层的概念术语的大换班”,其结果就只能是“以新的名词装饰旧的结论”,使文学批评从一种简单化趋向另一种简单化。

进入 90 年代以后,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在 80 年代理论争鸣、流派纷呈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更加开放、更加直接的国际现代化文化交流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对传统的文化模式和审美规范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也为适应新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形式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和参照。另一方面,由于对现代化的精神转换缺乏准备,人们在商品经济的物质诱惑和外来思潮的负面影响下,往往陷入一种失落迷惘和虚无彷徨的精神状态。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艺创作上,就出现了现在人们经常非议的所谓消解深度、颠覆主题、现象还原、主体缺席等取消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非文学倾向,因而使这种转型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己的精神品位和失去了往昔的社会荣耀。

然而尽管如此,90 年代的文学写作在它自我运作的系统中却仍然呈现出一种忙碌纷繁的景象,如其中既有 50 年来从未中断过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 80 年代后期延续下来的“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又有 90 年代兴起的“新市民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晚生代小说”、“女性主义写作”等等。对于这些纷纭庞杂、多元并举的文学现象的及时审视和评论,无疑应当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而又烦难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既收集了李子云、王安忆、朱立元、李振声、邹平、陈惠芬等人对于 90 年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和流变透视评述的文论,又选编了郜元宝、胡河清、蔡翔、何

清、王宏图等人对王蒙、汪曾祺、王朔、张承志、陈染、林白等个案批评剖析的文章。与此同时，为了对新时期以来上海的作家作品作出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评析，我们在这套丛书中还组织上海的评论家专门编写了一卷《作家论卷》，以便在目前文学批评普遍比较浮泛冷落的情势下，作为对转型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一种热切的关注和思考。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人们往往会把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未来的展望上。这一现象也明显地反映在这个时期上海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学科建设方面。如近年来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检讨与重建，关于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和趋势的评估与预测，关于对所谓后殖民、后现代、后新时期等“后学”的批评与争鸣……不言而喻，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今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1993 年由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在知识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发的迅速膨胀的物质欲望和利己主义如果不能得到与之相制衡的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制约和感召，便有可能导致以牺牲社会公德和人类良知为代价的严重后果。而人文精神的讨论，正反映了文艺界、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对于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真诚呼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的文艺理论界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和理论的前沿的。但是如果以跨世纪的历史发展的眼光对 50 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深刻的反省，就不难发现在这个领域中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亟需重视的问题和亟待提高的认识：

其一，要努力加强适合我国美学传统和现代化文艺实践的美学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的研究建设。我们知道，一直作为我国文艺理论批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原理作为一种科

学的学科体系，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由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也从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深化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各种新写实、新状态、晚生代、私人化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等纷至沓来……而我们的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却始终以不变应万变，凭借一些抽象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来“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其结果只能使得我们的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失去活力，并逐渐丧失了与其他理论流派和批评话语交流对话的能力。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传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因。继承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应当永远是开放的、实践的美学体系，而不是封闭的、教条的“规范美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发展过程的说明”，而拘守着过时的原理只能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要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就必须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用人类最新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它、发展它，并真正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兼收并蓄，多元互补，而不是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也要建立起自觉的理论兴趣和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术品格，这样才能共同为建设和推动面向未来的新的文艺理论批评作出贡献。

其二，如前所说，人文精神的讨论是至今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有志之士发出的一种旨在疗救当前人们的精神失落和世风日下的真诚的呼吁。在这方面，我们今后除了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努力为建构一套与我国当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适应的人文科学体系以外，还要在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上把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和对现实人生的不断启蒙对应起来，从而把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辨和诗化超越变为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自我完善和对社会公众道德情操的具体规范。同样，人文精神在

致力于纯文学的审美批评时，也应该关心对社会大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心理的引导和塑造。因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目前常常被文艺专门家们看成是文化垃圾和艺术泡沫的通俗文艺仍然是亿万群众文化消费和娱乐需求的主要资源，而且在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炒作下形成恶性循环，即粗俗的艺术品迎合了粗俗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而粗俗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又招徕了更加粗俗的文艺产品。这里似乎正好印证了老托尔斯泰的一个观点，即“在没有把商人送出殿堂之前，艺术的殿堂不是一座殿”。然而这毕竟是世界顶级文豪上个世纪坐在自己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里所说的一句不着边际的诗化语言，对于我们今天这些整个儿都已陷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知识阶层来说，除了依靠政府的文化政策和经济杠杆来加以必要的调节以外，恐怕也只能通过谦和耐心的审美引导和精神提升来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的重建就不能不重视文化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即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样才能把人文精神的讨论从建立当下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体系拓展为重塑未来世纪中国人的灵魂——用人文精神的圣火去点燃人民大众理想的火炬，实现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其三，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突问题。当人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和计算机网络化的时代，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已经以一种全球化的形式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未来世界的这种全新的文化态势，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态和对策呢？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某些精神部门是敌对的同时，就已看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时至今日，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资

源共享必将进一步打破人们之间的思想隔阂和文化壁垒，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在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首先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必须在全球整体化的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归宿。这里我们既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所谓“后殖民主义”，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是实现人类文化繁荣的根本途径；又不赞成以东方为本位的新文化保守主义，企图建立什么东方化的“天人合一”的大一统体系。因为这些显然都是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不协调的——越是平等的、自由的和全方位的现代文化传媒和交流方式，人类的文化发展就越是以无限丰富的多样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而不可能再去重蹈已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覆辙。所以未来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以平等自由的心态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的整体行列中来，相互吸取，相互整合，以达到全球性文化发展的自然融合。

当然，正像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一样，在实现人类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的矛盾冲突将不可避免，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和严重后果。其中如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必然会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甚至会阻碍破坏这些国家、民族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进程。而当这种文化冲突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形式走向极端，便会导致民族保护主义的排外政策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的加剧，使得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欲速则不达。所以在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时期，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而现在仍在忙于制造文化“断裂”和垄断文艺话语权的行为恐怕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信息时代的信息爆炸和传播失控也会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结构带来新的困扰和问题。如果说工业现代化造成的环

境污染曾经给人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和威胁，那么随着信息现代化而来的“信息污染”是否也会给人类的身心健康造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呢？这里我们如果不能及早着眼于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精神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的引导，恐怕是难以避免要受到这场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负面效应的影响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未来的世纪仍然是人们从初级文明走向更高级文明的过渡阶段。世界文化艺术的前途是光明的。

本卷为“思潮卷”，顾名思义所选的文章大抵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思潮性的文章与作家作品论以及纯学术的理论是有区别的，它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往往针对特定时期的创作现象提出一个较大的文学命题，有时还越出文学的范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体现了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认识，并在创作和批评中引起较大的回响。上海的文学批评界比较敏锐活跃。特别在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往往能开风气之先，提出一些重要而带普遍意义的论题展开讨论。即使是对全国性思潮的呼应，也能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却很少炒作，故作惊人之语。现在我们将各个时期中颇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起来，不难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上海文坛曾经涌动过的文学思想潮流。当然，其中也有些文章仅具有准思潮的性质，但仍在总体上反映了上海批评界关切过的热点问题。

文学思潮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时期的批评家因面对的文学现实不同而有不同的话题，因所接受的理论体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话语系统。因此在编排本卷时，时间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每个大的时间段包含一组或几组文章，每组文章谈论的是同一个或相近的话题，有些则隐含着一种文学思潮。本卷选择的是三个时间段中的文章，即文

革前(1949—1966)、新时期(1976—1989)和90年代。文革时期(1966—1976)由于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除了政治上“无限上纲”的大批判以外,选不出合适的文章,只能付之阙如(这与本书的编选宗旨也有关:凡属极左思潮、制造文字狱的文章,一律不予入选)。

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十七年”。“十七年”的文艺作为“时代的晴雨表”,自然不能不受当时愈演愈烈的“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和毒害,特别是文学批评,常常被要求执行阶级斗争工具和武器的任务,这显然同新中国建立后日趋迫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从文艺界经历的许多“阶级斗争”来看,很多都是扩大化和莫须有的。如1951年对上海生产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2年开始的对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6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镇压,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1958年对王实味、丁玲、罗烽和艾青在延安时期“反党言论”的“再批判”,以及60年代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其中包括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和一波高过一浪的文艺批判中,上海的文学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大重镇,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打击,文学批评界也在不断的“脱胎换骨”中受到严重的扭曲,挨整或整人,有时则兼而有之,程度不同地呼应过“左”的文艺思潮。更有姚文元一类投机分子靠一根棍子起家,从上海一直横扫到全国,由文运而官运,扶摇直上。这些当然是上海批评界的耻辱,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但即便如此,十七年中仍有真诚的探讨,正直的不满和大胆的质疑。剧作家冼群的文章发表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刚刚结束,对当时认为只有工农兵才能成为作品的主角,小资产阶级只能作为陪衬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文汇报》上持续近两个月的讨论。胡风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当是他在 1954 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长达 30 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翌年被作为反面教材公布，但由于此时他已调离上海在北京接受批判，所以本卷只能收录他尚在上海工作期间写的一篇短文，带有辩白的性质。罗荪曾是上海批评界的一位前辈，在《关于文学批评》一文中，他对“抽象批评”和视批评为“整人”表示了不满，提出要在文学领域中展开学术性自由辩论，这在当时可谓切中时弊。徐中玉的文章发表在反右前夕，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唬人、整人的恶劣作风，严加痛斥，至今读来仍令人钦佩其胆识。巴金早在 1962 年就提倡“讲真话”，要求作家鼓起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一类“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要求制止这种使作家担惊受怕、阻碍创作繁荣的恶劣作风。在“文革”中，这也成了巴金的一大罪状。以上这些文章，可以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高压手段和恶劣文风，要求艺术民主，提倡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创作环境。这正好与 50—60 年代紧锣密鼓的文艺批判运动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传递了上海作家和批评家的心声。但很明显，这些声音在当时仍然是微弱的，最终都在劫难逃。

“文革”把“左”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推到了极顶，终于使中国的文艺连同它所植根的人民一起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然而物极必反，随着“文革”的破产、推行极左路线的干将“四人帮”的垮台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极左路线的终结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崩溃。文学艺术终于出现了复苏的希望，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开始到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萌动于文学自身的思想潮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掀起了以拨乱反正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提到了日程上来。当时在全国文艺界范围内曾展开过文艺与

政治关系的讨论，而在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则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为文艺正名》一文，对经久不衰的“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发难，提出了正面的批驳，并组织了半年之久的讨论，吸引了各地人士的参加，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从当时的讨论情况看，在观点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有的仍坚持工具说，甚至认为吃饭拉屎都有阶级性。但通过讨论，原先的许多错误看法得到了澄清，普遍认为不能把文艺在特定年代发挥过的斗争功能作为主要或唯一的功能加以推衍，那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性。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当时被认定为“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而非某一阶级随心所欲的工具。文艺的特殊性、现实主义和多样化的原则，以及人民性重新得到了肯定，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公式化、概念化遭到了唾弃。应该说，这是1949年以来上海文学批评界首次推出的以清算“左”的文艺思想为目标的文学思潮，对于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特点，都有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

紧接着为文艺正名的思潮，是要求恢复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潮。在当代文学史上，真正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特别是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常常遭到误解和曲解，被认为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未能划清界线，甚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文艺常常被要求正面描写光明面，歌颂新时代的正确、光荣、伟大。在创作方法上先是提倡苏联首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又自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曾有人提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却一概受到批判。新时期初，文坛出现一股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在理论上同样出现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潮，有的还重提“镜子”说，为此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还发生过一场争论。在此我们仅选录对“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质疑的三篇文章，以供读者

参考。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亟需澄清理论上的混乱和纠正批评实践上的错误。王元化的《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所要强调的正是这个,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当时正好有几部作品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表现了生活真实,因触及了生活阴暗面被认为社会效果不好,受到了不公正的责难,王元化在文章中为这些作品作了辩护。在理论上他又针对割裂真实性和倾向性的二元论和庸俗社会学,指出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真实性之外,反对以“写本质”代替写真实,反对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去评论倾向性。此文以其犀利透辟的论述,对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5年前后,随着国外文艺理论和新方法的引进,国内批评界出现了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也作为一种新的学说被提了出来。方法论也罢,主体性也罢,首先关乎文学批评。南帆的文章肯定文学批评引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单一乃至僵硬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如果将生动的文学现象费力地强行纳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那么很容易导致另一种简单化,而这已为不少事实所证明。他提出,文学批评中的各种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向,同样应当经过研究目标的检验校正,即将文学批评集中于作品美学价值的产生、贮存和实现诸环节中。这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方法论讨论中,是既开放又较持重的观点。主体论在当时曾引起过激烈的论战,徐俊西的文章主要对陈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由于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灵现象,不能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几个现成结论,来代替对文艺的特殊审美方式——主体性的审视和把握,因此不应拒绝吸引国外有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对主体论的不足也提出了几点商榷,坚持了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理论界对学术问题所持的慎重而又开放的态度,以